

应县木塔发现的七件辽代印刷品

郑恩淮

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了辽代印刷品，其中辽刻经（契丹藏）、刻书、板刻佛画等，已于《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作过介绍，并发表了研究文章，而杂刻七件，却未曾问津，本文准备作详细介绍，并做初步研究。

一、新雕诸杂赞一策

框高22.3厘米，版广30.5厘米。白麻纸，蝴蝶装。书皮为麻纸入潢，贴有墨框双线纸笺，笺内木刻墨印楷书文字“新雕诸杂赞一策”。文内每叶二十行，每行字数不等，四周双线边框，楷书、工整有力。第一行题目“燕台大悯忠寺常住院内新彫诸杂赞随名各列如后”，在乌丝栏内，上有黑鱼尾，“燕台大悯忠寺常住”八字较下边字体稍大，疑为旧版刻补。共六行，十八赞，一百一十八会：“诸佛赞五会一，散花赞五会二，龙花三会赞三会三，如来降生赞三会四，四智赞四会五，旧波罗赞十会六，新波罗赞十会七，涅槃赞三会八，四天门王赞二会九，慎火真言赞二会十，五赞叹五会十一，五佛赞五会十二，八明王赞八会十三，五方赞五会十四，十六王子赞十六会十五，莲花部赞十六会十六，九龙赞九会十七，七佛赞七会十八。”其后乌丝栏内黑鱼尾下题目为“诸杂独

会赞四十五会”，一至三十三赞下只有标号，而无“几会”，三十四至四十一赞下，有“一会”及标号：“毗卢佛赞一，释迦佛赞二，毗卢根本赞三，释迦根本赞四，药师根本赞五，观音根本赞六，文殊根本赞七，甘露根本赞八，瑜伽中智慧赞九，瑜伽赞十，九曜赞十一，炽盛光佛赞十二，三宝赞十三，欢喜王赞十四，角位赞十五，观音菩萨赞十六，智慧波罗密赞十七，大集真言赞十八，大教王经四种赞十九，金莲花赞二十，引入道场赞二十一，三身赞二十二，佛顶赞二十三，五十三佛赞二十四，百佛赞二十五，千佛赞二十六，回向赞二十七，多宝二如来赞二十八，十吉祥赞二十九，护国人王赞三十，弥勒下生赞三十一，香花供养赞三十二，灌顶抛花赞三十三，珍宝赞一会三十四，五方四智赞一会三十五，十方帝释赞一会三十六，瑜伽偈赞一会三十七，□□漂流赞一会三十八，授记赞一会三十九，护身真言赞一会四十，陀罗尼赞一会四十一”。再后为五赞一百一十五会：

“□□赞六十二会一，祇园会赞十四会二，一百八名梵赞二十会三，□□□赞十会四，新添诸杂赞九会”。

新雕诸杂赞一策，共列六十四赞二百七十四会。这里“赞”、“会”表示何意？“应县木塔发现辽文物展览”时众说纷纭，有的专家认为“会”指法会，有的专家认为“会”指书会。笔者认为“赞”是赞颂、赞扬之意，梵语中赞为戍怛罗，偈颂而赞叹佛德者，即赞颂佛德，赞叹佛乘教化之人也。如新雕诸杂赞一策六十四赞中，有赞颂佛者，如释迦佛、如来佛、毗卢佛、弥勒佛、炽盛光佛、药师佛、五方佛、十方佛、五佛、七佛、百佛、千佛等；有赞颂菩萨的，如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等；也有赞颂四门天王、十六王子、欢喜王、九曜等；还有赞颂佛经者，如大教王经四种赞。总之，“赞”者，赞颂佛德、佛乘也。新雕诸杂赞一策中，所列二百七十四会，应为法会，即佛家应召开会、集会，曰法会、会座等，在此法会上赞颂佛德、佛乘也。

在距今千余年的辽代，燕台大悯忠寺能举办如此众多的法会，赞颂佛德、佛乘，说明辽代燕台大悯忠寺佛事之盛。另外，大悯忠寺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印刷出如此精美的印刷品，并广为散发，也可说明燕台大悯忠寺寺院经济之繁荣。

“燕台大悯忠寺常住”八字，如确系旧版剜补，说明此前其它寺院也曾用此版印刷并举办过大量法会，赞颂佛德、佛乘，这一点从一个侧面反映辽代佛教是相当发达的。

燕台大悯忠寺是辽代佛教圣地，也是政治活动场所之一，辽穆宗曾于悯忠寺接见南唐使节公乘溶。燕台大悯忠寺，即今天北京法源寺也。

北京古称燕台、燕京。燕昭王为延召天下贤士，置千金于台上，号黄金台，台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唐诗、宋词亦称老北京曰燕台。李白在《江上答崔宣城》中有“谬忝燕台召”之句。祖咏在《望蓟门》中有“燕台一去客心惊”之句。宋洪皓词《江城松花引》中有“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之句。金代慕燕昭王好贤之名，亦在城内建台，曰《金台夕照》，为燕京八景之一。燕京八景，即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波，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清高宗（乾隆）在颐和园餐秀亭后石壁上题“燕台大观”四字，诗曰：“燕台遥望淡烟濛，返照依稀禁御东。是处人家图画里，一川风景夕阳中。溪头棹响归鱼艇，牛背箫声过牧童。千里望诸留胜迹，几回凭吊向西风。”（《日下尊文录》卷四）可见自古燕台即为北京别名。新雕诸杂赞一策中之燕台，即辽南京，或称燕京。

悯忠寺即今北京宣武区牛街附近的法源寺，是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佛教圣地之一。《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引《塞北事实》曰：“燕山京城东壁有大寺一区，名悯忠寺。廊下有石刻云，唐太宗征辽东高丽回，念忠臣孝子没于王事者，所以建此寺而荐福也。东西有两砖塔，高可十丈。”按曰：“文惟简《塞北事实》称，燕山京城东壁

寺名悯忠，盖唐时幽州镇城遗址，在今外城之西及广宁门（今广安门）外地，故寺在其东。后条所载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称，寺在子城东门百余步。又景福元年碑亦云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可互证也。今则在外城之西隅矣。廊下石刻及东西两砖塔俱无考。寺额唐曰悯忠，明正统中改名崇福。本朝雍正十一年，世宗宪皇帝发帑重修，十二年二月工竣，赐额曰法源。山门内为大雄宝殿，皇上御书额曰法海真源，联曰：慧雨昙云，清净契无为之旨；金乘珠藏，通明开不二之门。”（《日下旧闻考》城市·外城·西城二）。以上记载，悯忠寺的历史及寺名的变更，已经清楚^①。《宸垣识略》、《畿辅通志》，《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等书均有类似记载。

大悯忠寺在辽代亦为著名寺庙，《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曰：“宋王曾上契丹事曰……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正南曰启夏门，内有元和殿。东门曰宣和。城中坊闹皆有楼。有悯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皆遣朝使游观。”《辽史》所载燕京悯忠寺，即新雕诸杂赞一策中燕台大悯忠寺，仅为燕台与燕京，大悯忠寺与悯忠寺之别。因《辽史》为脱脱主编，新雕诸杂赞一策中燕台大悯忠寺的写法似应更为准确。

二、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

纸纵36厘米，横37.8厘米、框高25.8厘米，广30.4厘米。麻纸，板刻墨印，字体工整有力。首题为“菩萨戒坛所牒”。二行为“受菩萨戒弟子”。三至十一行为骈体牒文“夫圣非元圣，由罪云灭而圣方陞，凡非永凡，因戒月圆而凡迥出。今者幸迁罪云已灭，戒月初圆，冀毕命以恒清，须亡躯而永护。从今一得，乃至果圆，誓不煞、盗、染、妄、酤，誓不说、赞、慳、嗔、谤。再起绝根，重罹无路。如夫登危望足，方节凭归，架海浮囊，岂

合中毁。至若连城楚玉，夺夜隋珠，世夫所奇，幽途何托？争堪遭喻于此者乎？唯慎唯持，以身以命。以是给牒，佩随箴规，故牒。”牒文后印有年款，“乾统 年 月 日”，末行为传戒僧押署，扁形宋字体“永安山玉泉寺传菩萨戒阿闍梨弘教大德赐紫释通牒”。

该戒牒完整，原折叠存放于牒封内。从牒文内容知为佛家十戒等，从牒后年款知印制于辽末天祚帝乾统年间(1101——1110年)，末添年月日，知尚未使用。

三、玉泉寺菩萨戒坛牒封

纵35.2厘米，横5.4厘米。麻纸，下部有污残。

该牒封成纸套形，上下开口，俗称筒子封。正面无文字，背面封合处盖有传戒僧押署，为扁形宋体字“永安山玉泉寺传菩萨戒阿闍梨弘教大德赐紫释通封”。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原折叠存放此牒封内。

从戒牒和牒封传戒僧押署知，传戒僧为永安山玉泉寺僧。永安山，即马孟山，因中峰形类马孟而得名，位于辽中京，今承德地区。《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曰“中京大定府有马孟山。”《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京本末》，中京大定府条曰：“契丹图志云，奚地居上东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旷，西临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东西八百里，连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号曰中京。”《明一统志》曰：“马孟山山广袤千里，中峰形类马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永安山在热河平泉、凌源、建平三县间，老哈河发源于此，古名马孟山。”从以上记载知，玉泉寺戒牒和牒封应为辽西京大定府永安山，即马孟山。传戒僧头衔有传菩萨戒、阿闍梨、弘教大德、赐紫。菩萨戒，佛经名，大乘菩萨僧之戒律也；传菩萨戒，即宣传大乘菩萨僧之戒律也。阿闍梨，译曰教授，为矫正弟子行为，为其轨则师

范高僧之敬称；弘教大德为弘通佛之教法之高僧；赐紫，唐时三品以上官公服为紫色，有时皇帝特加赐紫以示尊宠，辽代僧人也常受此种待遇。此传戒僧赐紫似沿用唐代制度，赐予德高望重的高僧的礼遇。总之，从永安山玉泉寺传戒僧押署知，该传戒僧是宣传大乘菩萨僧戒律的教授，是弘通佛之教法的赐紫高僧。从此传戒僧押署亦可推断辽代中京大定府永安山玉泉寺，定是当时著名寺院之一。永安山是辽？宗、兴宗、道宗避暑、游猎胜地。

四、菩萨戒坛所牒

纸纵33.4厘米，横36.6厘米，框高26.2厘米，广30.7厘米。

麻纸，中部缺，下部残。

该牒为板刻墨印，单线边框，字体工整。残存文字为：

第一行“菩萨戒坛所牒”

第二行“受菩萨戒弟子”

第三行“伏闻如来秘藏……难禀受”

第四行“非舍那释迦无……萨埵无以称”

第五行“其议所以离恬……痴暗凡夫”

第六行“转持学于贍……”

第七行“如观牖隙……”

第八行“摸有则羯……”

第九行“渐荣于心……意助”

第十行“圣主之鸿图……牒知者故牒”

第十一行“天庆……牒”

末行传戒僧押署“坛主传善牒戒阿闍梨弘大德赐紫……”

为扁形宋体字。

该戒牒与永安山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内容及传戒僧押署，均不相同。押署“传菩萨戒”前无“永安山玉泉寺”，却有“坛主”，二字。“传菩萨戒”后文字系根据牒封补入，其头衔与永安山玉泉寺菩

萨戒坛所牒相同，只是押署不同。“坛主”二字，“坛”，梵语为曼荼罗，以筑坛安置曼荼罗之诸尊，义释为坛；“坛主”，应为佛教徒在诵经时，主持其事之高僧也。

从“天庆”二字知该牒印刷于辽末天祚帝天庆年间（公元1111——1120年）。

五、菩萨戒坛所牒牒封

纵35厘米，横7.3厘米。

麻纸，呈纸套形，上下开口，俗称筒子封。正面无文字，背面封合处盖有传戒僧押署“坛主传菩萨戒阿闍梨弘教大德赐紫释m牒封”，扁形宋体字。封内无牒，菩萨戒坛所牒似应存放在此牒封内。

以上四件戒牒和牒封为佛家僧尼的身份证、或称通行证，均未曾启用，即做为佛家瑰宝珍藏于应县木塔四层塑像内。

辽代，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势力很大，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达到鼎盛。统治阶级赏赐土地、房屋于寺庙，赐高僧以很高的头衔，是大力提倡佛教的具体行动，寺庙高僧可以印制戒牒，发予僧尼，享受免赋、免役特权，游方脚僧可以云游四方宣传佛教而不受留难，是统治者保护佛教而赐予的特权。如应县木塔共出之《佛说八师经》是“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据考大昊天寺是辽道宗秦越大长公主舍燕京棠阴坊第为寺，道宗施五万缗以助，落成，赐额“大昊天寺”。又如应县木塔共出之写经《僧光章为卖常住什畜状》，为僧光章卖常住什畜辩解状。乾统元年（公元1101年）因卖常住什畜受罚，由于同案人在逃未获，光章具状辩护。说明寺院不仅有免除赋税和徭役的特权，还有独立审判的司法权。

戒牒在唐代称祠部牒，皆以绫素绵素细轴，北宋用纸，南宋用绢。木塔发现之戒牒说明，辽代戒牒同北宋相同，为纸质，板刻

墨印。

六、讲经启

纵31.3厘米，横14.5厘米。

麻纸，木刻墨印。残缺较重，仅存“五台山松子欲（峪）下水院讲经律论沙门□□”，其左两行小字为“大康 年 月 日”，“报人……僧果”等字。

从文字内容看，似为某某沙门讲解经律论的通知单或告示。五台山松子欲（峪）系指当时辽朝境内蔚州附近的小五台山。箫村同志《辽朝别有一五台山》^①有详细考证。“大康”为辽道宗年号（1075——1094年）。末书讲经律论日期，知尚未使用。

七、卜筮书残叶

纵17.2厘米，横14.5厘米。

麻纸，仅存半叶，下部和右侧残缺。原为蝴蝶装，现存半叶，计十六行，有行格及单线边框。由于上部文字缺，从残存文字看，系用五音及“木奴”、“天牛”、“玉犬”等占卜吉凶，以求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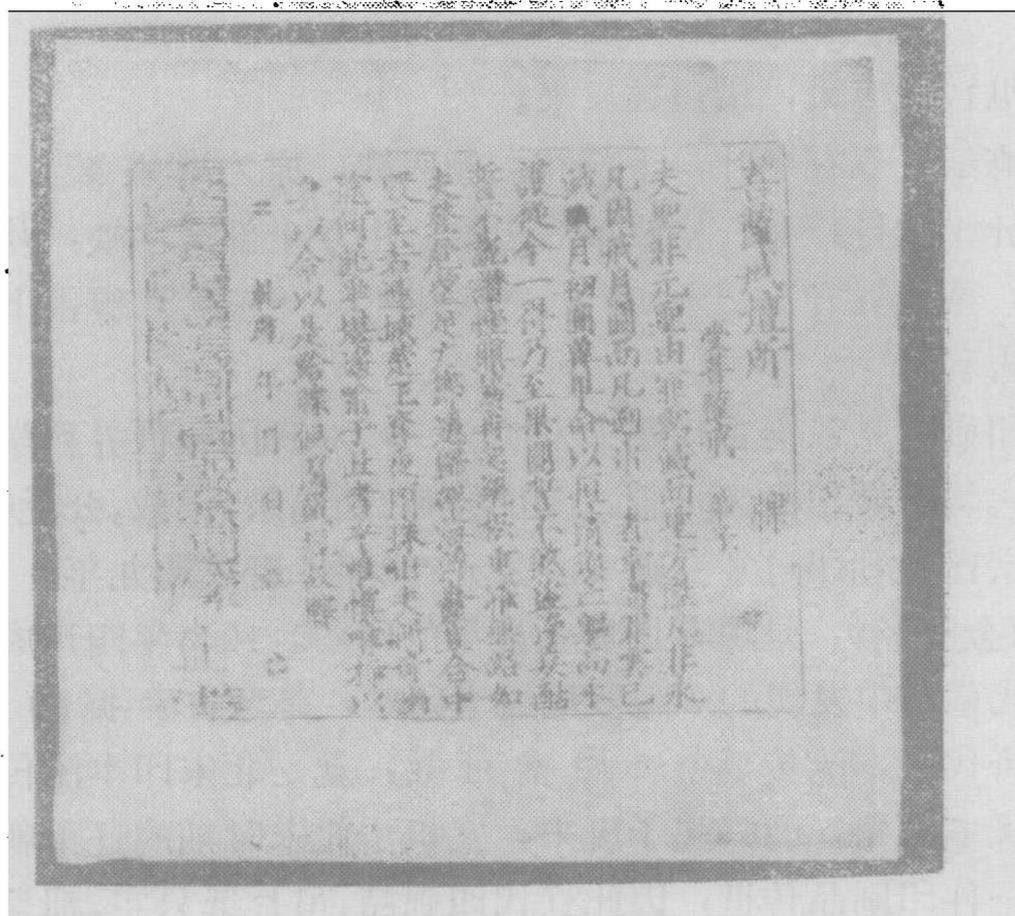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均曾做出巨大贡献。据邵经邦《弘简录》记载，公元636年，唐太宗已经刊印过《女则》。公元868年（唐咸通九年）木板雕印的《金刚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本。1944年四川成都望江楼唐代墓葬中发现的《陀罗尼经》印本，是考古发掘的最早印本。唐代印本流传至今者屈指可数，就是北宋印本流传至今者如凤毛麟角。而兴起于唐末，盛极于北宋时期的辽王朝，此前未有一件印刷品传世，因此辽代印刷品，虽片纸只字，都是非常珍贵的，此次应县木塔发现如此大量的印刷品，对研究我国雕板印

刷史，对研究辽代科学、文化、宗教、艺术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佛教经典也随之传入我国，先是手写传抄，后有印本流传。唐朝发展到高潮，大翻译家玄奘将印度大乘经典的精华，基本上都翻译介绍来我国。北宋太祖四年(971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了我国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不久，辽朝圣宗也雕造了举世闻名的《契丹藏》，此次应县木塔即发现《契丹藏》十二卷，辽单编刻经三十五卷。这七件杂刻也进一步说明辽王朝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雕印均相当兴旺发达。

注：《文物》1984年9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



菩萨戒坛所牒